光宣政治论要

董守义　徐　彻

一部清史，不同于已往任何王朝史，它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解体的全部轨迹。光、宣时期是这个解体轨迹的终结段。多年来，学者们就这段历史问题发表了大量颇有建树的研究成果，使整体研究的深化在史实的取材上得所依凭或选择，在观点的把握上得所认同或修正。本文不忖翦陋，力图运用唯物的和辩证的思想对光绪宣统时期政治的要义作出不夸饰、不损抑、不回避的宏观概述，以表明我们对这个时期历史发展的逻辑认识和历史反思，并以此求教于方家。

一

历史进入19世纪，古老的中国已经在封建社会中蹒跚地行走了两千余年。有识之士龚自珍还在道光朝就发出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哀叹①。这是哲人对末世厄运的预言 。不过，清王朝在遭受了咸、同时期“内忧”和“外患”的沉重打击后，却奇迹般地存续下来。于是封建统治者额手相庆，把这称为“同治中兴”。其实，这不过是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而已，构成社会总危机的各种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在新的形势下，旧矛盾以新形式表现着，新矛盾也层出不穷。

所谓新的形势，主要是国际上西方列强在19世纪60至70年代先后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化，对华侵略由主要是商品输出转变为加强资本输出，东方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也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且疯狂参与列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的殖民争夺。在国内，随着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大起义渐次失败，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走向沉寂。

这样，在光绪前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又重新上升起来。诸如，清流派与洋务派的斗争，慈禧集团与恭王集团的勾斗，湘系与淮系武装集团的倾轧。在被统治阶级中，农民阶级及其他民众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此伏彼起，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设厂以及中国近代工矿业的兴办，诞生了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并出现了早期的自发工人斗争。

到光绪中期，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邻邦和我国边疆地区的殖民侵略和瓜分，又使一系列矛盾更加激化，更加复杂。例如，清流派与洋务派的政争与和战之争交织，湘淮两大集团的畛域之分与帝后党争关联，资产阶级维新派对封建守旧派的变法斗争与帝后党争相因应，包括义和团运动在内的广大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与封建顽固派的排外逆流曾经一度汇合。

光绪后期至宣统时期，清政府已经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于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斗争集中表现为与其代理人——清政府的矛盾斗争。其中包括广大农民阶级的抗捐、抗粮及“扫清灭洋”起义，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大搏斗，资产阶级立宪派向封建统治阶级争夺参政权力的斗争，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关于要不要粉碎帝制的论争。此外，还有中央集权与督抚分权的矛盾，满汉地主阶

级联合统治的分裂，以及清政府在对帝国主义全面屈服的同时也还有对其侵略野心的局部抵制，等等。

所有这些，构成晚清历史的矛盾纷呈、波谲云诡、风雷激荡、色彩斑烂的全息立体连环画卷。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矛盾的总爆发中耗尽了最后的精力。中华民国的共和旗帜取代了大清帝国的龙旗。中国成为亚州第一个建立共和制度的国家。

二

国家具有双重职能,即对内镇压人民反抗与对外抵御侵略。光宣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虎视鹰瞵、瓜分豆剖之势直接威胁到清帝国的生存。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惊呼中国已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必须把同治初年开始的“自强”新政的政策重心由“平内乱”转向“御外侮”。从此，在中国大地上除了继续经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外，又兴起了一系列以“求富固本”为目标的近代民用工业；敷设并开办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国防机动能力的铁路、轮船和电报事业；陆续设立了一些教授先进科学和技术的近代学校，等等。为了抵制沙俄对新疆地区的侵略，清政府派遣左宗棠规复西北，派遣崇厚和曾纪泽先后赴俄交涉并索回被占领土伊犁，在新疆改设与内地相同的行省制度；为抵制日本对台湾岛的侵略，派遣沈葆桢带兵轮巡视台湾，逼走侵台日兵，在台湾岛也设置行省，由刘铭传为首任巡抚，进行区域性近代化建设的试验；为抵抗英国对川藏地区的觊觎，直到清亡之前，清政府还在川滇开展改土归流运动，为民国初年西康建省奠定了基础。

然而，洋务派的危机感以及为应付危机而进行的新政并没有为全部统治阶级所认同。他们开展的各项改革都遇到重重阻力：“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局中之委曲，局外未能周知，切要之经营，移时视为恒情”。② 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新政建设，当然不会有可观的效果。

统治阶级中的另一些人也看到了列强虎视鹰瞵的险恶形势。但是他们认为只要中国能够振纪纲、端风俗、正人心，就可以抵制列强侵略。他们总是根据传统观念批判“自强”新政，“往往陈义甚高”，自视为“清”流，而把干实事的洋务派视为“浊”流。这些人在统治机构中多居言官清要地位，对于洋务派的所作所为，事成则求全责备，事不成则追究改革的责任而将破坏者轻轻放过。这些人被称为“清议派”。

问题在于，清议派总是“正确的”，总是振振有词。当他们反对兴办海防，建造兵舰，购买新式武器时，就说中外已经议和，“何必为此猜嫌之举”③，好像他们很珍惜和平，也最怕浪费国家帑项。当中外关系紧张的时候，他们又马上站在主战立场上，指责洋务派的折冲樽俎和审慎交涉为“畏葸”，主张不顾实力的“直捣夷巢”④。当他们反对架设电线，促进信息手段近代化时,理由是这会破坏风水地脉,致令民情不安⑤。他们的出发点是维护社会秩序。当他们阻挠修筑铁路时，理由更多，诸如造路会滋扰民间，造成骚动呀！造路虚糜帑项，使民困国乏呀！即使能致工商繁茂，却更将吸引洋人前来呀！中国人自私分散，铁路纵能造成终将难于保护呀！⑥ 一句话，他们以“国情”不同作为保护旧事物，反对新事物的借口。

问题是复杂的。清议派不仅反对改革，有时也把评议批判的矛头指向统治阶级中的违制行为，甚至连慈禧太后重治宫禁守卫人员庇护太监以及大修颐和园也遭到他们的有力批评和

抵制。这些批评也是根据“祖制”或传统道德戒律而发的，但是确实起了纠弹时弊、端正吏治、抑制腐败、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

问题的复杂还在于，清议派的议论有时与中华民族的反帝爱国要求相一致。他们在帝国主义威胁和侵略面前主张奋起抗争。主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这使清议派赢得了历史的荣光。一般地说，清议派无拳无勇，因而是脆弱的，当中外战云密布的时候，他们慷慨言战，当强敌压境时又大惊失色，在中法战争中被派赴福建海疆的清议派大员一闻炮声，即先逃跑；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原是清议派重要成员的吴大澂统率辽东战事，“徒托空言”⑦，遇敌即溃。但在另一种情况下，清议派人物如张之洞就任两广总督，也能够团结前敌将帅，促成著名的镇南关——谅山大捷。一般地说，清议派人物鄙薄洋务以为不足言，但后来也有些清议派人物很重视洋务，如陈宝琛，宝廷、张佩纶、吴大澂、张之洞等，一旦掌握了方面大权也直接办洋务。一般地说，清议派对洋务派开展的守势外交的批评有些不顾实际，对世界大势失于无知，但他们义正辞严的主张有时也使洋务派唯恐对外让步会被他们“夸大加以攻击”，而不得不在交涉中表现出某些“不妥协的精神”⑧，这集中地表现在中俄伊犁交涉中。

就是说，清议派干扰了洋务新政的实施，却也发挥了某种纠弊补偏作用。所以，洋务派虽然讨厌清议，有时又联合清议派共同向腐败政治作斗争。而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虽然利用清议派监督和限制洋务集团，但也讨厌清议派妨碍其奢侈腐化。这种复杂的矛盾关系可以视为“制衡”机制。后来，慈禧太后罢黜了奕䜣为首的全体军机，又沉重地打击了清议派，使之风流云散，这种“制衡”机制就破坏了。从此，言路萧条，慈禧太后走向独裁统治，国事日非，却无人能匡救弊端。

三

“大清帝国”是由清太祖和太宗时期开基，经过康、雍、乾三朝大力开拓而成的多层次封建大帝国。它包括满族统治者所由以兴起的中国东北部和原来明王朝统治的中国本部；蒙、回（又称新疆）、藏广大地区；周围一系列有朝贡关系的属国等三个层次。

光绪年间，帝国主义加紧对清帝国藩部和属国的侵略。清政府采取的应付方针是：坚决保守藩部，量力保护属国。

蒙古、新疆、西藏在清代称为外藩，是清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次鸦片战争前后，帝国主义加深对这些地区的渗透。清政府于光绪初年派左宗棠规复新疆，建为行省，使其行政制度同于内地，大大地强化了中央对新疆地区的统一领导，促进了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效地挫败了英俄帝国主义对新疆的侵略野心。对于内外蒙古，清政府继续清初以来与蒙古王公的政治联姻，政策是成功的，终清之世，内外蒙古王公虽受到沙俄拨弄，到底不肯背清事俄。对于西藏地区，英帝国主义不仅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居然派兵入藏，企图把西藏从中国肢解出去。清政府一面与英印当局交涉并签订条约，被迫应允部分要求，撤废西藏地方当局在英军压力下签订的非法条约，一面实施“固川保藏”方针，派内地军队入藏，抵御英印当局。与此同时，清政府曾力图在西藏实行改革，不久因清帝退位而未果，但毕竟挫败了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阴谋。

清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同时也继承了封建大国主义传统观念，称中国是“天朝上

国”，大皇帝是天下的“共主”，而把中国周围的国家称为属国。实际上，它依朝廷统治力量所及的程度将这些邦国分为不同层次，对于接受册封的国家列为朝贡属国，对于军政力量影响不及的国家虽也列入属国范围，实际上平等对待。清政府与朝贡属国的关系是封建的宗属关系，这与帝国主义宗主国之于殖民地的关系有本质不同。清政府只要求朝贡属国称臣，国王的更迭以取得大清皇帝册封为合法，并定期派人到北京朝贡方物，清政府则按照“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经济上的实惠，而不过问该国内政外交。⑨这种封建主义的属国政策给帝国主义列强对这些地区国家的侵略造成可乘之机。

苏禄、琉球等属国孤悬海外，当其被帝国主义占领或吞并时，清政府鞭长莫及，未能给予实力保护。下缅甸及越南南圻六省及哲孟雄遭到侵略，清政府也未能及时注意。只有当越南北方和朝鲜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清政府才声明此系中国属国，并以此为理由出兵保护。⑩帝国主义则以该国内政外交既然不由中国操纵则不认为中国属国，并悍然出兵占据。封建的宗属法则在殖民主义逻辑面前方枘圆凿一窍不通。

事实上，尽管许多朝臣要求出兵保持宗主权，而清廷之所以出兵主要是由于“唇亡齿寒”的忧虑。中国和越南以及中国和朝鲜之间都是山水相依的千百年来不断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友好邻邦。而且，很明显的是侵越的法国意在中国西南，侵朝的日本意在中国东北。所以，保护越南及保护朝鲜既是保护属邦，又是自我防御。这两种意义是统一的。在流行的中外史学著作中，认为中法和中日之间的这两场战争不是为争夺属国而战，或者只是为争夺属国而战的观点，都是片面的。

战争只是历史的瞬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在和平中度过。但战争又是和平时期政治的继续，是对和平时期政治制度、方针、路线的全面检验。

帝国主义对清帝国的侵略由沿海沿江，及于藩部，又及于周围属国，同时又加深对内地的侵略。这是全方位侵略。清帝国在对外妥协的同时，也进行过一些本能的反抗。在沿海沿江，它被迫开放一些口岸，但仍节节抗拒，它被迫放弃了黑龙江北岸和乌苏里江东岸的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在藩部，它失去西北地区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到清亡时又失去科布多和乌梁海地区，但它仍保有蒙、回（即新疆）、藏地区。在一系列属国方面，它虽然失去了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众多的朝贡国，但清亡时仍保有对廓尔喀的宗主权。在朝鲜，它曾连续挫败日本制造的壬午和甲申两次兵变，把日本的侵略战争推迟10多年；在中法越南之役中，福建海军因被偷袭而覆灭，而陆军则以战胜者姿态收兵，签订了一个鸦片战争以来少有的不赔款的条约；即使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北洋海军也还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陆军在局部战场也有一些小胜仗。

这些，都说明同光以来实行的洋务新政使清帝国的国力有所增强，两次鸦片战争中那种“形同木偶”和“有海无防”的状态已经基本改变。然而，这些又说明封建帝国同资本帝国主义的搏斗多么力不从心，藩部剥损，宗属体制崩溃。而列强则来势汹汹，踏破藩篱，深入堂奥，掀起了瓜分狂潮。八旗劲旅“无敌天下”的神话早已粉碎，“天朝大国”的声威也荡然无存。整个中国面临亡国危机。

有识之士纷纷指出，洋务派那种枝枝节节地改革无补大局，必须全面改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维新派则倡言：全面改革要从政体改革这个根本问题上着手。

要改变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谈何容易？因此，这种更高层次的改革呈现一波三折的景象。

四

戊戌维新运动是政体改革的第一次尝试。

资产阶级维新派批评洋务派，但并不反对办洋务。维新思潮对洋务思潮的扬弃首先是继承并发展，然后是质的转换。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维新运动中一些洋务派人士也表现相当积极。

维新思潮与洋务思潮的根本区别在于要求君主立宪。他们企图走俄、日道路，特别是走日本式拥立天皇进行变法的道路，以为“法自上变顺而易”。可是，光绪皇帝只是一个“想有作为的皇帝”，在他背后有一个死死抓住大权不放的老太后，这使他无法做中国的“明治天皇”或“彼得大帝”，反倒做了中南海里瀛台的“囚君”。康有为等维新领袖也没有成为伊藤博文，——尽管他们很崇拜他，想以其为楷模，但是机遇和学识都不如他，而不是勇气不如。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界认为维新派是改良主义者，而改良主义只懂得用和平手段乞求改革，云云。其实康梁等人在变法时所缺乏的首先是对西方社会制度和思想的深刻了解。他们的西学知识主要得自译本西书，而没有象伊藤博文那样留学多年，在阐述变法理论时只好求助于今文经学，形成不中不西，中西杂揉的思想，以致被顽固派旧经学家斥为篡改孔学，就连支持变法的翁同和也认为康有为的著作不过是“说经家之一野狐禅[11]”。伊藤博文等人进行维新时有一个较好的文化环境，人数众多的留学生群是维新事业的骨干。康梁变法时，中国留学生不仅人数少，而且回国后受压抑，地位低。康有为在西花厅问话后，发现清政府中枢机构竟然守旧盈庭，其顽固无知的程度超过原来的想像。为了减轻压力，此后他就不再提开国会，制宪法，只是建议开懋勤殿。近年新发现的史料表明，康有为搞变法不只是和平改革，他在暗中曾经策划过“围园执后”的武装政变[12]，企图一举除掉阻挠变法的慈禧太后等顽固派。只是棋慢一着，全盘皆输。所以说，搞君主立宪的人，不一定都是和平改良主义者。

封建社会实行人治，资本主义社会实行法治。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相对扩大，这是历史的进步。这种进步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所有民族都是福祉。可惜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为狭隘的阶级利己主义蒙蔽了眼睛，他们把皇室和满族贵族的利益说成全部满族的利益，忧心忡忡地说：保国会“徒欲保中国，不保大清”（文悌语）；赌咒发誓：“变法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吾宁输润于外人，而不使奴隶分润”[13]；（刚毅语）慈禧太后一翻脸，把变法事业置于血泊之中。

戊戌政变后，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都是倒行逆施，例如慈禧太后计划“废帝立储”，王公大臣统率义和团围攻外国公使馆和教堂，刚毅制造假照会激怒太后向八国同时宣战，载漪为促使儿子早登大宝不惜将整个国家和民族作为赌注。私欲加无知加盲动，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八国联军蹂躏京津及华北，甚至于东北，勒索4.5亿两赔款，加上四厘利息和39年付清，达到9.8亿两，再加上各省地方性小额赔款，总数就达到10多亿两白银。以10亿两而论，已经相当于清政府10个财政年度的纯收入，完全浪掷出去。

爱国固然要反帝，但爱国不能爱封建主义。我们在痛斥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的时候，丝毫不能放松对作出如此祸国决策的封建专制政府的指责。

虽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为了反思，我们有必要换一个角度考虑：如果利用义和团

对八国宣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这个决策是否就正确了呢？

从浅层原因言之，宣战是为了报复帝国主义列强对“废帝之储”的干涉。从深层原因言之，宣战不仅是处理皇室内部事务的需要，而是对道咸以来中国被迫开放的总反攻。顽固派以为社会的一切丑恶现象都是开放造成的，只有把洋人全部赶出中国，才会恢复封建的一统天下，才会天下太平。这不仅是对以君主立宪为目标的维新变法的彻底否定，也是对洋务新政的彻底否定。

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略怀有深仇大根，他们的英勇斗争令帝国主义终于明白瓜分中国为不可能，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气。这是他们的伟大历史功绩。但是，义和团的主体毕竟是农民，在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情况下，农民们很容易受人利用，他们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接受极端顽固派的“统率”，将一切资本主义经济的先进性和先进科学技术一概归入“洋”的范畴加以仇视，排斥和破坏。他们在工业浪潮面前是和封建势力一样抗拒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分析在中国同样适用。

历史善于捉弄人。《辛丑和约》签订后，清廷被迫彻底放弃闭关锁国的梦想，宣布实行新政。它羞答答地宣称：“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罔变之治法”　“令甲令乙，不妨改弦以更张”⑭。它之所以羞答答，是因为它所实行的“新政”，乃至后来的“预备立宪”，都是戊戌时期维新志士所力争而又被它自己无情践踏的东西。

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历史的航船摇摇摆摆，走过了维新——排外——新政这样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路线。

公平地说，无论清政府是在怎样的形势下和怀着怎样的动机而推行新政，毕竟是对历史潮流的认可和顺应。新政的实施还是有些成绩的，废除科举，大办学堂，广派留学，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设立商部，允办商会，制订商律，奖励实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厘定官制，修订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部分地引入了资产阶级法制机制；编练新军，整顿海军，力图重建国防，加速了军事近现代化建设；最后，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宣布预备立宪，是对戊戌以来中国人民宪政运动的正式首肯。

五

新政引出两个始料不及而又十分必然的结果。

其一是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初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872—1900年，全国民族资本工矿企业约156家，资本额达5000余万元；而1901—1911年间，全国新设厂矿达340家，资本额达1.01亿元，十年内新增数超过前此二十年间数额的2倍多⑮。与此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和组织程度也在加强，据十分保守的数字，到1907年各地成立商务总会、分会达46所⑯。民族资产阶级痛苦地感觉到帝国主义的经济压力。帝国主义在《辛丑和约》签订后，利用清政府筹办新政需款孔亟的机会，极力扩大对华资本侵略。其矛头首先指向中国铁路和矿山两大利权。这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构成直接冲突。从1903年起，以民族资产阶级为领导的全国各阶层人民参加的收回利权运动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终于演化为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保路运动。在收回利权运动中，又出现了1903年的拒俄运动和1905年的全国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等。几乎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清政府都没有妥善地对待人民的爱国要求，相反，它替帝国主义列强镇压和破坏爱国运动，捕杀爱国人士。进步报刊愤怒谴责这种

"宁令国人死，勿触外人怒"⑰的可耻行径。清政府在人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

其二是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和人民民族和民主觉悟的提高。还在1901年，中国留学界就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武库中借用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用来作为争取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他们痛恨帝国主义，高倡民族主义说："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世界上最令人可惊、可惑、可憎、可恶者，莫如今日之所谓文明国也"。他们又力倡民主主义，郑重地宣称反帝必须反封建，绝不能"恃今日之政府官吏以图存"，"欲立新国乎，则必自亡旧始"⑱。1903年，清政府镇压人民的拒俄运动使更多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反清道路，他们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告别保皇派，划清"爱国"与"保皇"的界线、集结到革命的大旗下。不过，在革命派中间的思想分歧也是明显存在的。邹容热烈地称赞和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扫除数千年种种专制政体"，建立人民享有充分民主权利的"中华共和国"⑲。陈天华则着力阐述反帝必须先反掉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的道理。⑳章炳麟是公认的地主阶级反满派代表，他根据传统的"夷夏观"辨明"满清"统治中国为不合理。㉑孙中山则批评这种片面的"反满论"，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是恨满州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㉒。1905年，革命派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核心，随即展开对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大论战，并通过大量革命书刊教育和影响国内广大群众。1907年以后，革命派纷纷回国动员军民，发动起义，为燃烧专制统治撒播革命火种。清政府的末日到了。

慈禧太后无疑是晚清统治集团内富有政治经验的反动核心。她的崩逝使统治集团骤然失去重心。后继者摄政王载沣缺乏政治经验，急切地扭转长久以来形成的外重内轻局面，他竭力推行皇族集权政策，收督抚大吏之权，罢黜实力雄厚的袁世凯，造成满汉地主阶级的重大裂痕；他重拂民意，一手制造皇族内阁，不但未能达到加强爱新觉罗氏皇权统治的目的，反而自己戳穿了立宪的骗局，使包括资产阶级立宪派在内的全国各阶级各阶层都对清廷失望了。载沣执政的一系列决策，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20世纪的最初十年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辛亥革命完成了时代所赋予的革故鼎新的伟大历史任务。它不仅结束了清帝国26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而且对两千年封建社会进行了总清算。尽管由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封建主义余孽远未肃清，革命后的中国又多次上演过复辟丑剧，而封建专制大厦是无可挽回地坍塌了。那些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无一不遭到人民的唾骂，"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历史箴言不绝于耳。

---

①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第88页。

②、③、⑤、⑥《洋务运动》丛刊一，第27页；五、第105—106页；六、第139—154页；五、第327—331页。

④、⑦、⑩、⑭《光绪朝东华录》，总第814；3554；3441，1773；4601页。

⑧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中译本）第32，35页。

⑨关于属国问题，（台北）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郭沫若《中国史稿》第四册均有相类论述。

⑪《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二日。

（下转第112页）

74、75 .156页；第172页。
⑰施瓦茨著《财富和权力的探索·严复与西方》（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第198页。
⑱阿理托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第177页。
⑲㉛魏克曼（F.Wakeman）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中国南方的社会混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6），第10页；第3页。
⑳㉔㉕前引邓嗣禹书，第196、206页；212页；5页。
㉑㉒陈氏著《中国与西方·1815-1937，社会与文化》（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9），第204页；第261-262页。
㉓郝严平著《19世纪中的中国买办·东西方的桥梁》（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第1、207、211、217-221页。
㉖巴菲尔德《游牧帝国与中国》第2、7页。
㉗费正清著《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第5页。
㉘巴尼特著《国家形象·传教士与清末维新的某些概念成分》（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6），第160-169页。
㉚孔非立著《1796-1864，清末中国的反抗运动及其仇敌·军国主义与社会结构》（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第5-6页。
㉝据丹麦学者李来福（Leif Littrup）最近告我，如今欧洲学者的研究有着比美国更大的自由。

（上接第72页）
⑫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光明日报》 1985年9月4日。
⑬《清议报》第二十册，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一日。
⑮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93页。
⑯⑰《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三年载；第4卷，第11期。
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53、58、67、92页。
⑲邹容：《革命军》。
⑳陈天华：《猛回头》。
㉑章炳麟：《革命军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㉒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卷第324，325页。